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蔣經國與台灣

● 楚崧秋（資深新聞工作者、大學研究所新聞評論學教授、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

平民領袖影響深遠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三日為蔣經國先生辭世十整年。今日在台七、八十歲以下至二十餘齡的人，不論與他是否有過一面之緣，對他都會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認識，留下亦淺亦深的印象。

譽之者大抵認為他深入民間，與群眾同苦樂，確實不愧為一平民領袖。

毀之者則視他為國民黨治台初期二十年，推行所謂「白色恐怖」的幕後牽線人，思想作風都近保守，且因父親的刻意培植而登總統大位。

平正而應屬多數人的看法，則認他為「大家的蔣經國」、「歷史的蔣經國」，其對台灣與整個國家的功過得失，應由大多數國民來認定，非任何少數人所能偏執。

回溯蔣經國在台近四十年，綜析其與台灣這片土地及二千萬同胞的關係，大別之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自他三十八年在台定居至五十四年一月出任國防部長之前，先後約十六年，他給民間的總印象，大概是身分特殊，有些神秘兮兮，這與他幕後主持情治工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幸而他自四十一年起擔任青年救國團主任時間甚長，最初不少人懷疑這與共黨青年團的組織有無同質之處，後來事實證明乃是一單純的青年愛國自強的團體，蔣氏本人亦充分自然顯現為一站在青年一邊的領導者，這對於其民間印象大為有助。

非常平民非常領袖

第二階段是從五十四年至六十七年擔任閣揆先後六年，合計為十三年左右，這無疑是他在台灣權力梯上攀昇快速的年代，也是他獨當一面、展現才能、魄力、見識、建樹的年代。

尤其是接掌政院之初，以大有為政府高自期許，先是六十二年底提出五年內完成十大建設計劃，在全般設計定案之後，親自督責並嚴格要求各級政府，網羅各方面的人才，全力以赴，計日程功，這是日後被譽為「台灣經驗」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更是國際間所謂「台灣奇蹟」能夠出現的根本。

台灣生存發展第一

第三階段則為他擔任總統至去世的十年。這固是他個人功業的最高峰，但也是他為台灣這塊風雨飄搖的土地，為中華民國這個災難頻仍的國家作犧牲奉獻的落日時期。

通常人們所見到的蔣經國總統，幾乎從來看不出有一點意氣風發、志得意滿的模樣，相反的，只覺得一個平凡平實的老人，一個樸質無華的長者，像苦行僧一般，帶著相當沉重的步履，穿梭於民眾與田野之間，一切用行動和事實來證明，他不是一個外來的過客，更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領導人，而是一個十足生根於此的在地人，有高度的責任與義務來爭取台灣的生存發展。正因此故，這是他與台灣相互融入的十年，也可能就是同胞們對他印象最深的重要十年。

求新求變走向民主

人們只要稍一回顧，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外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不論冷戰策略、外交關係、經貿利益以及民主趨勢各方面，都發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變化，任何一個重要地區及國家幾乎都難置身事外。台灣由於主觀與客觀多元因素的影響，彷彿處於此一重大變局的漩渦中心地帶。這也正是蔣經國必須面對的空前挑戰，在時代、環境、潮流三者都在急變之秋，他究竟如何為台灣生存和發展領航。

吾人今日試一解析蔣經國時代的十年期間，他似乎一直在思考如何求新求變，面對大的方向與最重要的目標，必須要有優先次序，並分別輕重緩急。他每每慨乎言之：「今日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審察他肆應並望切實掌握此一變局的主要方針策略，約有數端

- (1) 繼續充實軍力，確保台海安全，尤其是在六十七年底美國宣布與我斷交廢約之後。
- (2) 加速經濟建設與台灣現代化，提高自存能力，擴大發展空間。
- (3) 面對反對勢力的形成，逐步走向民主化，並期許國民黨大力自我改革，面向群眾。
- (4) 勤跑基層，接近民眾，促成族群融和，增進人民福利，以具體行動加強對政府向心力。

(5) 面對兩岸關係逼人而來的變化，妥籌自處與因應之道。

論者認為蔣氏的這幾項大政方針，不僅能提綱挈領，抓住要害，而且也確實反映了他要帶領台灣立於不敗之地的用心和苦心。

不過對於上述第三點政治走向民主化一端，民主腳步緩急平議，每有認為他的態度與決策，太拘泥於過去的傳統立場和作法，未能面對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國內政治生態的急遽變化，從而加快一些民主開放的腳步，讓反對意見更能及時充分表達。至於人民自由結社組黨的權利，何妨提早於七十年代之初，就能獲得適當保障。

當然也有不少謀國論政之士，認為在這一點上，對蔣先生不免責之太苛，求之太切。

因為在他切身領導國家的十二年期間，國內外的大形勢及其所衍生的種種重大問題，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沖擊，蔣氏為確保台灣生存惟恐不及，實難同時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

這種仁智互見的想法，一時也許難以論斷，然歷史必然會有公正的對待。而不少媒體如商業周刊等，近期所作民調，大都肯定蔣經國對台灣的整體貢獻，高於歷任及現任總統，多少亦反映出民心之所向。

解嚴開放步為營

最為難能可貴者，應屬他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連任總統之後至其辭世之日為三年多時間，雖因國事操勞而健康日損，但其對世事的敏銳觀察力和判斷力，並及時妥籌善策，肆應未來，決無愧為一老成謀國、掌握機先的領導人。更由於自己知道糖尿病對他健康的威脅日深，國家大政不能不早作明智的準備，抉擇和計劃，以免因他一旦無法執行職務時，而造成任何內外不安或失調的局面。

為了爭取時間，為了穩定大局，更為了台灣的前途與同胞的福祉，他十分明顯地讓世人了解，只有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有安全，任何執掌大局的人才才有生存與打拚的空間與機會。

為了這個總的目標，也即是為了二千萬同胞的長遠利益，他於是憑藉執政黨人對他的高度信賴，同胞們對他的一分濃烈情義，乃斷然決定：

(一) 借七十五年十月美華盛頓郵報女發行人格蘭姆 (Katherine Graham) 來訪機會，讓舉世知道我國行之三十餘年的戒嚴法，將於七十六年七月依法定程序廢止。

(二) 人民組黨權利以及政黨的合法成立因戒嚴法的失效而獲保障，是為「黨禁」的取銷。

(三) 七十六年下半年行政院表示報紙限制登記自七十七年元旦解除，亦即行之已三十餘年的「報禁」由此開放，以落實新聞和言論自由。

(四)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內政部通過並宣佈大陸探親辦法，為兩岸同胞親屬隔離四十年建立合法公開的來往管道，這對急於還鄉的退役老兵無異為及時雨，同時也為兩岸關係緩和開啓一扇門。

深恐身體等不及了

這幾項影響廣泛而且深遠的決策，到今天早已視為理所應為，不足為奇，可是在當時卻都是屬於驚天動地的。由於這些重大決定來得相當匆促，且每發現有許多未能配套作業的地方，我曾問當時一直參與研決的國家安全方面最高負責人，為什麼沒有準備得更周延一些，他的答復是：「經國先生恐怕他的身體等不及了，如不在他手中處理好，深恐節外生枝，反增對國家全局一些不好也不需要

的困擾。」

對於他這一說法，不但可深深體察出蔣氏在健康日壞時的孤詣苦心，而且也確能反映出大眾所以對他感念不忘是由來有自。就是——一直對他持反對態度的人，往往也會透露一些不忍深責的體諒。

實事求是問心無愧

自認「也是台灣人」的蔣經國，與我們一同走過四十年艱難歲月，故世已匆匆十年。

史學家梁啟超說過：「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就是把過去的事實，從新估價。」

當我們回顧蔣氏一生的史實，檢視他在台究竟作了一些什麼，尤其他作為一個與台灣現代歷史結緣如此深長的領導者，我認為最公平正直的態度，應該是拋開一切是非恩怨的包袱，而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與居心來予以評價。

所謂「實事」，就是對蔣氏這位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客觀環境，以及與此緊相關聯的個人思想、理念、行為和一切與公眾利益相結合的活動資料。

所謂「求是」，就是要把他以上種種重置於當時歷史環境中，來判斷他和時代潮流是否相違背，與客觀存在是否相叛離，與大眾意志是否相抗拒，從而作出客觀冷靜的評估，來確定其應具的地位和價值。

準此以觀，蔣先生以其長期留俄的背景，身逢一個家庭、社會、國家都處於天旋地轉的年代，尤其是來台四十年的後半生，他所面臨的是如何以孤臣孽子的大義血忱，來支撐他父親蔣中正先生的保台反共職志，讓全中國人在共產集權統治之外，還能保有另一種選擇。

以往史實在在說明，蔣經國曾經在台灣度過不少天人交戰、是非混淆的日子，可是他似乎不曾有所辯解。他也曾不斷接受國家的招喚和時代的考驗，而把一切視為守分盡責，但求問心無愧。

當其處於權力高峰的晚年，更以威權體制的改弦更張，民主開放的大步向前，解開過去許多政治上的死結，將台灣領向一個嶄新而穩定的境界。

今天在他去世十年之日，不論大家如何來紀念他、評鑑他、論斷他、臧否他，都只具一些衡定歷史人物的作用。而更其重要者，乃是要「將過去真事實予以新意義與新價值」，也就是要以他與台灣血肉相連的關係為上綱，痛惜得來何等不易的「台灣機會」，大家捐棄成見，化除畛域，確實掌握住我們應該走，可以走，走得通的穩健道路。

楚崧秋：「蔣經國與台灣」插圖（文見五十四頁）



① 作者楚崧秋（左）早年與蔣經國（右）晤談時留影。
② 右起：作者楚崧秋、陳裕清、蔣經國一九七二年在中華日報社合影。



